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

陈凤珍

摘要: 当今世界,女权主义已经使得女性的声音不再是一种边缘化的声音,但是总体上看女性作家和批评家的“生态意识”都很薄弱,文化思想界关注作家的“精神生态”的人很少。鉴于此,本文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角度切入这一时代的困惑,通过女性文学的精神生态和文学批评生态的话语资源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强调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命运,东西方文学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逐渐被人们认可的今天,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 女性文学; 生态文学; 女性主义; 批评话语

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使得全球化时代的生态文化批评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一文化现象中人们不仅关注自然生态的失衡,而且更关注精神生态的失衡。“处于被人类弄得百孔千疮而又危及人类生存的大自然中,文学批评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眼见在跨国霸权横行之下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濒临绝境,文学批评怎么能够麻木不仁?面对一个个被物质欲望折磨得烦恼、沉沦、异化、孤独而无家可归的性灵,文学批评怎么能够置若罔闻?”^①当今世界面临着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严重危机,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一批男性批评家不辱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近几年“接连发表绿色宣言和生态文学评论,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系列生态批评论著,……显露出持续发展的声势。”^②当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时,当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之时,一直在文坛上争夺话语权的女性作家和女性批评家当然不可能置之事外而无动于衷。

作为生态批评中一支新的生力军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建构有待完善有待系统化,但在新的世纪,生态女性批评者必将同男性批评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对整个地球生态的责任和对维护人类精神生态平衡的责任。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建构加以阐述。

一、在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建构中 重塑女性文学身份

时代的脚步跨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回顾女性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历程时,不难发现,女性文学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绩:张洁的“方舟”意识,张辛欣的“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呼声,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的强音,王安忆的“三恋”象征,铁凝的“玫瑰门”意象,张欣的“爱又如何”的叹息,林白的“个人化”的写作姿态,都为女性文学留下了历史的脚印。但当我们着眼于发展,在首肯女性文学实绩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已陷入误区。为使女性文学少走弯路健康发展,女性批评学者必须穿越其所陷入的误区指出其未来发展的出路。

大体上说,女性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文化症候和误区。

误区一:精英主义的误区。这表明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还局限在知识圈子内游走、实验,影响相当有限。正如批评家孙绍振所说:“中国女性一多半集中在农村,……可是,这个庞大的最需要救助的中国女性群体几乎就不在中国‘女性主义’的考察与援助范围之内”。^③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转型时期的社会语境中,女性文学第一步要做的工作,与其超越现实奢谈人文主义,不如从揭开民众的现实生存困境切入,从民间立场出发去关注那些弱势群体,那些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特别是乡

村女性。

误区二:女性文学与男性话语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女性文学创作中,总是放逐男性,拒绝男性在场,即使在场,所塑造的两性形象也是趋于对立的两极,且体现着“女尊男卑”的女权意识。正如王岳川教授所说:“这个社会如果只有男性写作,是一种太单调、太机械化、太竭泽而渔,太工业化社会的强权话语。”^④但是如果女性主义只是将男女两性在男权文化秩序中角色进行置换,将女性置于中心地位,扮演启蒙者、救世主、批判者,强化女权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另一种“强权话语”。这种狭隘的女性立场无助于对人性的超性别思考,显然是女性文学的弊端。女性文学的最终目标是两性和谐美好,仅仅靠驱逐男性,建立一个没有男性存在的世界只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虚妄,也是达不到反抗男权霸权目的的。

误区三:女性文学似乎成为展示女性隐私的平台。“女性写作最主要的方法是对女性隐秘体验的展示,而所谓女性隐秘主要是女性生理隐私和性隐私。”^⑤女性过分展示和描绘女性的生理隐私和性隐私,把女性解放等同于身体解放,实际上是将女性解放和性解放混同,而女性解放就成了乌托邦,这也是有悖于女性所追求的“平等”和“解放”理念的。也正如阎纯德所说:“我认为那种淡化与疏离‘政治’、‘拒绝崇高’、唯‘私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而独尊的倡导是一个死胡同,有害于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繁荣。”^⑥可以说,这些误区已在限制并还在继续限制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

在探讨女性文学出路的可能性时,不难看到,如果女性批评家不能跳出女性文学来反思女性文学,如果仍然只是过分地关注女性作为性别差异的本体感,诸如身体特征、生命感性、肉身存在等,就逃逸不了自我身份丧失的境地,这既得不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又不能在一个新平台上引起深刻的对话,更解决不了女性文学精神出路问题。因此,如何摆脱局限,如何在更宏大的文化视野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从而提升女性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女性文学批评工作者应该远视的前景。在女人作为女奴的年代,要实现人的权利,就要解构和颠覆男权中心,这是女性文学必经的过程,但不是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

是使女人成为人之后,去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元,实现女性作为人类另一半的自我价值,要思考人性的全面伸张,要表现对人类未来价值的终极关怀。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人类要建设和谐社会,而“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生态和谐、人态和谐及心态和谐”^⑦。回归和谐应该成为当下女性文学主题嬗变的主流,成为当下女性文学中两性关系描写的主旋律。女性批评者应使女性作家们在进行个体生命言说时多一些理性思考,使女性作家们在创作时解除男女两性彼此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使男女两性走向平等、共存、和谐并在女性作品中留下表达爱意、温暖、悲悯和希望的人类情怀,从而写出有精神重量与高贵灵魂的生态女性作品,这是女性批评者和创作者共同担当的价值重建任务。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女性批评者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树立生态文化意识,建构新的文学批评模式——生态女性文学批评。新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生态批评,其学派建构的条件基本具备——既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引进,又有中国博大精深的本土思想资源可以挖掘,从而形成学派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在西方文化话语中梳理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资源

西方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影响国内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是第二阶段的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而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生态女性主义阶段。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包括各种各样致力于揭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掠夺之间联系的观点。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核心观点,正如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斯普雷特内克所说:“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⑧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价值等级制思维,即赋予位于上层者更高的价值、地位和名誉;其二,价值

二元论,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双方,给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更高的地位和价值;其三,统治逻辑,即一种论证结构,它证明某种统治是正当的。在这些特征中,第三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因此统治逻辑不只是一种逻辑结构,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它从伦理角度证明某种统治和支配是“公正的”和“正当的”,并为这种统治进行伦理辩护。西方父权制文化就是用这种统治逻辑来证明奴役自然和女性的合理性的。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制统治。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在认识论层面上阐明各种压迫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致力于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制度观念,在相关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为此,普拉姆伍德和纳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性主义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但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单一女性主义流派,所以我们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划分,分为三大派别:哲学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女性主义。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观念层次上分析妇女和自然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行为受观念支配,对女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要解放妇女和自然,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观念结构”。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家凯伦·沃伦在其《生态女性哲学》(2000)一书中归结出“统治的逻辑”：“这种父权制的价值——等级思想导致统治逻辑的产生,即这样一种……思维,它解释并维护了‘劣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服从,它还为此现象争辩,以证明它是合理的。”^⑨沃伦认为二元制和等级制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统治逻辑对于压迫性的观念构架才是最重要的,她相信只有把“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作为本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动摇“由二元思维、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三个支点搭建的父权制堡垒”^⑩,才能实现自然和女性的真正自由。“她从哲学的高度、从逻辑的推理中得出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的道德危机之间的同步关系。”^⑪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压

迫的精神文化根源,把文化精神的改变视为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麦钱特在她的杰作《自然之死:女人、生态学和科技革命》中指出,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象征着自然界暴力的女巫唤来风暴,……这混乱无序的女人,就像混沌的自然,必须被征服。”^⑫文中进一步指出,理性时代以前将自然视为一个养育万物的母亲——一个有机生命体——的想法,使得人类认为挖掘大地的行为就如同谋杀自己的母亲,因而不愿任意破坏自然。但到了理性时代,因科学家证明地母不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人们便开始肆意侵占破坏地球。第一个涉及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是罗斯玛丽·鲁特,她早期批判“男性的超越的二元思想”的一部力作是《新女性/新土地》(1975)。书中写道:“妇女必须看到,在一个以支配模式为基本的相互关系的社会里,不可能有自然存在,也不存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联合起来,以展望一个崭新的根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及相应的价值观。”^⑬鲁特认为,人类错误地企图超越物质世界,超越真实的女性世界,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阐述的,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⑭,文化超越女性化的企图造成了社会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自然必须被毁灭,沼泽地必须变成商店林立、绿树成荫的步行街,草地必须变成混凝土的公路……”^⑮面临这种灾难性的剥削、“地球的毁灭”,鲁特在《新女性/新土地》的结论中呼吁:“对人类生活的规划必须终止‘征服自然’或剥削物质世界的观念……相反,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生态学的语言呼应体系,在我们生活、运作、存在于其中的宇宙系统和我们的意识之间寻找互惠。”^⑯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着重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双重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

在《生态女性主义》(1993)一书中,范达娜·希瓦和德国学者迈斯反思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生态环境和妇女的剥削,对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妇女

和自然的生殖能力的剥夺,其本质都是父权制的”^①。并进一步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一种新的人类学,这种宇宙观和人类学承认在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合作、相互照料和用爱来维护的”^②。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视自己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者,反对所有认为人类具有内在统治他人的权力的观点,提出所有的不平等,无论是存在于人类内部的,还是存在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都是错误的。

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宣扬的是一种替代的文化观,它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③。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的和睦相处,建立平衡、和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其在宣言里曾说: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地球上的人们需要建立新的同盟,使彼此连接,并按照自然规律平等地承担责任,对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宣布,我们是相互依存的。^④毫无疑问,这个相互依存的宣言,也应该是我们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共同宣言。生态女性主义者“不是试图寻求一种以女性为性别基础的品质来替代男性品质,而是提倡一种女性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不仅将改变生产和再生产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哲学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哲学,它志在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并以本体论哲学的姿态批判传统哲学的父权制世界观,而它所包含和体现的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的价值体系,为女性作家和批评家们认知、表现和观照社会生活、世俗人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和准则。

三、在东方文化话语中发掘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精神资源

中华民族具有生态文明的悠久传统,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对此,可以从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文化思想、生态经济思想三个方面来加以梳理。

其一,生态哲学思想。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产生了朴素的辩证

自然观。这就是“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这种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阴”和“阳”是周易的两个基本概念,从语源学看,它们肯定与日光的向背有关,在《周易》中,它们被赋予抽象的意义:“阴”一般代表保守性、柔弱性的事物或因素;“阳”则一般代表进取性、刚强性的事物或因素。《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例如《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这里实现了“由宗教向哲学的转化,鬼神作用在这里是对天人关系的依附出现的”^⑥。《周易》所体现的天、地、人一体的有机自然观渗透到了后世各种哲学思想当中。

道家生态思想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宝库。道家崇尚自然,超越世俗功利,主张返璞归真、混沌无为,向往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生态境界,是一种自然生态观。道家崇尚的“道”,就是自然界自身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老子》首先提出“道法自然”和“辅万物之自然”的观点,含有深刻的生态思想。这所谓自然,就是天然自成的生态。老子将“道、天、地、人”合称为“四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他认为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强调人取法自然,复归自然,融入自然,而不是违背自然,不应叫自然为我所用。在道家哲学中,最核心的思想是“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理解成“无所作为”,这完全是误解。《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第五十九章)意思是管理社会和对待自然最好是像种庄稼那样因势利导。道家倾心自然,关切生态,明显表现出一种自然生态观,给人深刻启示。

儒家思想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世界观,是一种重视现世、积极入世、强调社会有序性的学说。它主张有等级的泛爱,高扬仁义,以人为本,以生为荣,其理想是建立一种和睦相处的人伦生态环境。实际上,不仅道家持“无为”观念,而且儒家也持“无为”观念。据《礼记·哀公问第二十四》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关于天道

的问题:什么是天道?什么是应该注意的最可贵的东西?孔子回答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还用《揠苗助长》这则著名的寓言来阐明“无为”的道理。从“无为”观念出发,《中庸》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就是说,人对万物的作用是调整、引导,而不是粗暴干涉。《孟子·尽心上》进一步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而构成了以“亲亲”为核心的生态伦理三级模式,提倡把人类之爱由近及远地扩展,并把人类之爱扩展到对自然物之爱。

另外,儒家还主张“天人合一”说。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这种主张是有可取之处的。宋代名儒程颢把董仲舒的思想演化为著名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遗书》卷二)。儒家理学大师朱熹把“仁”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他给“仁”的定义是“心之德而爱之理”,在天地则为“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为“温然利人爱物之心”。(《文集·仁说》)这就从根本上把爱人与爱护自然统一了起来。儒家的这种伦理生态观,对于中国作家精神生态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生态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生态意识,中国文化重生、贵和、富有诗意。所谓重生,就是指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古老的《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就含有生命、生存和生态等意思,“生生之为易”。荀子曰:“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这就要求,人不仅应以“礼”(道德)待人,亦要以“礼”(道德)对待天地间的自然物,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既然天人合一,人我一体,人要珍视自己的生命,亦应推己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人文化成、陶冶情操、提升德性、“厚德载物”、“爱惜物命”,是古人必备素质。贵和,以和为贵,不仅注重人伦和谐,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里的“和”,也就是中国

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生命化成为的“和合”文化。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荀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如管子“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第12)。墨子认为天下不安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荀子也认为:“故人欢欣和合之时,则忠臣教子亦革离诡而有所至矣。”(《荀子》)。在这里,“和”为和谐、和睦与和平;“合”的意思为合作、结合与联合,“和合”代表着不同质的要素联系构成的整体系统。这种“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

其三,生态经济思想。在“天—地—人”一体的有机自然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许多精彩的生态经济思想。春秋时候,《管子·八观》提出:“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结果将“闭货之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吕氏春秋·义赏》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明清之际的学者孙兰甚至提出了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思想。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破坏了万物的协和,则“鲜不为患”^②。

以上所分析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话语资源,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瑰宝,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整理和辨析。在当前生态女性批评构建之时,不失时机地开发本土资源激活、中国生态话语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在人类前沿问题上同步思考 并发出东方的声音

人类在经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以后,如今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西方的现代话语中心之一和男权中心已经受到了中西思想家的质疑批评,一个更为健康和平等、更富有人性和对精神生活拓展更有兴趣的生活模式正在形成。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是生态文化和

生态批评兴起的世纪,更是人类对自己文化身份和灵肉关系更为清醒地加以区分和重塑身份认同的时代。

当今世界,女权主义已经使得女性的声音不再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声音,如何在女权主义浪潮之后,重新清理女性作家和批评家薄弱的“生态意识”,对作家的“精神生态”加以更多地关注,成为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重要维度。如今,中国思想界与西方思想界的差距正在缩小,不少有意义的共同关心的话题成为中西思想界几乎同步思考的对象。在西方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尚未成熟的时候,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家应抓住此机遇,通过女性文学的精神生态和文学批评生态的话语资源两个方面切入问题的实质,强调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命运,东西方文学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逐渐被人们认可的今天,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从而在这一前沿问题上留下中国学者的思考和东方女性的声音,就有可能实现双重超越——超越自己的文化遗产、超越西方,真正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为人类的精神平衡、灵肉平衡,以及东西方对话的思想平衡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①② 张浩:《生态批评的时代责任与话语资源》,《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7月,第26卷,第4期。
- ③ 孙绍先:《“贵族化”的中国“女性主义”》,《天涯》,2005年,第1期。
- ④ 王岳川:《女性歌吟·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复归》,《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 ⑤ 杨彬:《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的困惑与出路》,《当代文

坛》,2005年,第5期。

- ⑥ 阎纯德:《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
- ⑦ 黄志斌:《和谐论》,《合肥工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 ⑧ 查伦·斯普雷特纳克:《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 ⑨ 凯伦·沃伦:《女性主义和生态学:制造联系》,《环境伦理学》,1987年,第9期。
- ⑩ 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求索》,2004年,第4期。
- ⑪ 鲁桓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 ⑫ 卡罗琳·麦钱特:《自然之死》,纽约,1980年,第127页。
- ⑬ Rosemary R. Reuther. *New Woman/New Earth*. New York. 1975.
- ⑭ Murry Bookch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alo Alto. Calif. Chesire Books. 1982., P1.
- ⑮ 严启刚、杨海燕:《〈启蒙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20卷第5期。
- ⑯⑰ 妇女经济和发展组织:《生态女性主义宣言》,《生态女性主义新闻信札》,1990年,第1期。
- ⑱ 肖巍:《女性主义伦理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
- ⑲ 《在激进的理论中寻找启示读Mies与Shiva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1期。
- ⑳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
- ㉑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
- ㉒ 刘正:《周易发生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77—478页。
- ㉓ 韩光辉:《孙兰的地质学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1卷第3期。

(陈凤珍

中文系文艺美学访问学者;

指导教师

王岳川教授)